

# 天主教早期在中日两国传教策略比较

周 韬

(江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江苏 无锡 214122)

**[摘要]** 从16世纪中叶开始,耶稣会士携天主教先后进入日本与中国。当时,处于战国末期“下克上”风潮中的日本是由“轻文重武重商”的武士阶层所主导的封建割据社会,中国则是“重文轻武轻商”的士大夫所主导的中央集权社会。中日两国社会文化传统的大相其异,迫使远东耶稣会采取了不同的传教策略——“商教一体”与“科教一体”。

**[关键词]** 中国; 日本; 天主教; 传教策略; 比较

**[中图分类号]** B97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616(2009)02-0019-03

## On the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Preaching Strategies Adopted by the Society of Jesus

ZHOU Tao

**Abstract:** Catholicism was introduced to ancient Japan and China in sequence by the Society of Jesus since the middle of 16th century. At that time, Japan was a feudal society in which the palaces guards who advocated militar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Contrarily, China was a central government in which the scholar bureaucrats who advocated literature were the leading governors. Differences in traditional society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s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resulted in different preaching strategies —integration of business and education vs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Key words:** China; Japan; the society of Jesus; preaching strategy; comparison

自16世纪中叶起,耶稣会士之所以能携天主教先后进入日本列岛与中国内陆,得益于他们的先驱所制订的适应性传教策略以及当时特定的中日社会文化背景。其于中日的布教过程与结果不尽相同是缘于中日两国不同的应对方式。如果说16世纪东来耶稣会士在华是以科学文化充当了传教的“诱饵”,即所谓“科教一体”的传教策略,那么在日本,则在本籍葡萄牙商人的配合下是以商贸利益为“诱饵”进行传教的,即所谓“商教一体”。不同的传教策略的出台反映了中日两国文化的价值取向与国民性格:中国重文轻商,是文化主义;日本则轻文重商,是即物主义。

东来布教的先驱——弗朗西斯哥、耶稣会士沙勿略登陆日本后,为了使日本尽快实现天主教化,沙勿略认为前往京都、获取国王(天皇)的布教许可是不可缺少的。但眼前正处于百年战国时代末期,一派兵荒马乱、凋敝的京都使他的“从中央到地方”的传教计划完全化为泡影。沙勿略无奈返回地方,继续寻求各地方领主大名的布教保护。萨摩的岛津贵久、山口的大内义

隆、丰后的大友义镇、天草的志歧镇经、天草尚种、肥前的大村纯忠、有马的有马晴信等西国大名都为葡萄牙贸易利益所吸引,纷纷许诺领地内的传教许可及保护。但是,如果看不到葡萄牙商船前来贸易的话,未能如愿的领主们的保教立场就会发生逆转,对天主教进行排斥和打击。因此,为获得这些地方大名的保护,沙勿略将天主教与来航的葡萄牙商业贸易结合起来,制订了“商教一体”的传教策略。

显而易见,日本统治阶层与耶稣会传教士的结合不是宗教性的,而是纯物质利益性的。这种结合是糅合了二者的各自所需,即传教士的宗教信仰与日本人的贸易利益追求。传教士们利用大名们的趋利心理而得以获得传教支持与保护;另一方面,大名们利用传教士的宗教理想而从“南蛮贸易”中获取物质利益。不同的需求之所以能够“求同存异”,获得统一,主要有以下几个条件因素:第一,保教权的因素,教俗事业的捆绑使得东来的葡萄牙商人与耶稣会士能够结成一体;第二,日本割据纷争的局面为传教士与西方商人提供了灵活、自由的选择余地,得以用紧俏的贸易资源“搭售”日本人并不喜欢的西洋宗教;第三,日本人的“泛神信仰”

**[收稿日期]** 2009-01-09

为西教的进入提供了宽松的精神环境;第四,日本人的从众心理及严格的社会等级秩序,使得大名们能够成为外来传教士可以依赖的合作伙伴;第五,日本人淡漠的宗教情绪与强烈的现世功利主义思想使得大名们能够迅速为贸易利益而出卖其精神信仰领地。因此,在交涉双方——耶稣会传教士与大名领主的背后分别站着对方所真正关注的对象——葡萄牙商船与需要上帝拯救的领民。因此,可以说在“商教一体”的传教策略之下,传教士与日本大名只不过是东西方物质、精神“交易”的“经纪人”而已。强势的欧洲人挟强大的物质力量使其“商教一体”的传教策略得以成功实践。

布教与贸易是葡萄牙与西班牙对日交涉的两大要素。正如前所述,宗教和世俗事业是作为这两个天主教国家的一体化国家政策而同时向海外推进的。日本的统一权力一直试图将布教与贸易分割开来而只要贸易,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sup>[1]</sup>

赵德宇在总结 16、17 世纪日本天主教的荣衰时曾指出,在日本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天主教热潮中,护教大名们的“经济头脑”清晰可见,织田信长的宽容也只不过是“两害之中取其轻”。统治阶层的这种极其现实的功利态度预示了天主教在日本的前景并不乐观。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对外来文化的取舍是统治者的“专利”,他们可以随时、任意决定某种文化的命运。<sup>[2]</sup>当日本结束战乱割据走向“天下静谥”的政治统一时,天主教便逐渐失去了其以往的政治利用价值,在劫难逃了。

## 二

与战国末期虚弱的日本比较起来,明末清初尽管中国的国势开始衰弱,但相对于西方仍处于强势,在政治、经济、文化治理发展上中国仍走着自己的道路,这使西方对华的教务扩张只可采取文化渗透、精神征服策略。曹增友指出:“为此,罗明坚、利玛窦秉承上峰范礼安的指示,在道德和自身文化上下工夫,以谦卑精神,以对中国习俗、礼仪的适从面对中国社会。此外,因科学相对于终极层面的信仰具有更广泛的价值追求向度,在崇尚知识文明的中国更容易产生某种向心力,传教士由是以科学为布教工具。”<sup>[3]</sup>因此,传教士们将他们自己携来的欧洲科学技术变成了一种引入宗教教义的序曲。巴多明神父于 1735 年写道:“为了赢得他们大都不懂并以好奇心钻研的自然事物的知识,而博得他们的尊重,再没有比这种办法更容易使他们倾向理解我们的天主教神圣真途了。”<sup>[4]</sup>因此,“科学充当了诱饵的作用”<sup>[5]</sup>。

明末清初,天主教在华传播历经突破海禁、兴旺,

再致衰败的变化起伏,而这一时期不同时期的传教士科学活动也表现出与之相应的变化特征和策略效应。耶稣会以科学为工具,配合“和儒尊孔”策略取得了起始的成功。但科学和宗教的价值取向不同,尽管利玛窦等人将科学包装为“天主教真谛的间接证实”,来强调科学传教的意义,但还是遭到教会内部所谓维护教义圣洁的基要派反对,从事科学被认为是“改变了为上帝服务的性质”<sup>[6]</sup>。

科学传教体现了当时耶稣会的务实精神。耶稣会在宗教改革上是保守的,但在与异教文化的沟通对话上却是灵活积极的。它注重科学知识的作用,“培养具英才的基督徒”<sup>[7]</sup>即表明了该会的建会旨要。这时期来华的耶稣会士大都有良好的科学训练和学问、技艺,有的甚至是在欧洲有影响的科学家,这使他们能够胜任以科学为手段的传教使命。当然,这时期传教士对科学的切入是被迫的,是在体验了武力征服和直接传教的失败之后才感悟到了科学传教的重要。因此,他们于科学的参与就不是如唐、元时期来华传教士那样是自发和不经意的,而是有目的的,其科学活动显现出浓重的策略和功利色彩。正如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巴多明所言:科学是用来赢得中国人的尊重和注意的,以吸引他们潜心听讲基督真理<sup>[8]</sup>。

耶稣会以其独特的、富于变通的传教策略,注重以西方较为先进的天文、地理、数学等科技知识赢取中国皇帝及士大夫阶层的关注与信任。由于明王朝的“海禁”政策,天主教各教会是经历了千辛万苦和无数挫折之后才进入中国的,而其中设法与中国知识阶层发生思想交流,采取“科技传教”策略的只有那些本身就有着优良学术传统的耶稣会。在极大程度上,通过“补儒”、“合儒”而“儒化”的耶稣会传教士,以其卓越的学术才能征服了当时的中国士大夫阶层。

围绕利玛窦所制定的这种适应性传教方法,传教士内部一直存在不同意见,一些耶稣会士不同意利玛窦的“西学”传教途径,对于数学、天文及其他科学知识是打开中国信仰大门的合适方法之说持怀疑态度。1614 年,兼任澳门主教区总主教的卡瓦略禁止在所有住院向中国人传授数学或除《福音书》之外的任何其他科学。视察员班德安则在 1629 年否定和谴责某些传教士放弃了宗教而从事科学。但是,对知识传教路线的干涉未能产生结果,因为传教士出于对实际利益的考虑绝不会放弃使他们在华取得重大成就的手段,何况入清以后一部分耶稣会士入伺宫中,专门为皇室传授科技知识,并想借此而为整个传教区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尽管“使用科学作为传播宗教的间接手段从一开始就是耶稣会在华传教的一般特征”<sup>[6]</sup>，但从实际结果来看，明清时期传教士的科学传教活动对整个中国社会生产生活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这是因为成熟的中华文化对异文化的条件反射性的拒斥作用。主要表现是：第一，西方的科学知识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反差过大；第二，根深蒂固的华夷思想禁锢了人们吸取外来文化的思想动力；第三，科举取仕使得西方科技变成旁门左道，缺乏功利，使其难以获得知识阶层的积极推介而进入广大国民社会。此外，耶稣会的上层传教路线也是导致其科技知识未能在中国展开影响的原因之一。

### 三

中日两国传统的宗教观都有“泛神”、“入世”的特征，但日本武士阶层以及民众的现世“趋利”性格更显然。日本学者宫崎贤太郎指出，关于日本人的天主教受容问题有两个关键点，其一是“来世志向与现世志向”，其二是“一神教与多神教”。至于第一点，宫崎贤太郎认为，“在日本的宗教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时期，即在民众水平上对来世的关心凌驾于对现世的关心。即使弥勒信仰、地藏信仰、观音信仰中具有来世救济的一面，但也未能改变这样的基本事实，即现世利益追求始终是庶民百姓信仰的中核”<sup>[7]</sup>。这也是地方大名能够为追求现实南蛮贸易利益而迎纳外来天主教信仰的重要原因。而在中国，一些博学的传教士们最后蜕变成了清朝宫廷的一种官吏，专心于介绍欧洲科技文化知识，而对天主教信仰的传播渐疏渐远。1614年，分管日本和中国教区的省会长柯艾略发布了禁止向中国人讲授数学，或者是讲授除了《福音书》之外的任何其他科学的教谕。但这道教谕很快就被撤消了。因为科学在中国成了耶稣会士们吸引最有学识的人、使他们之中的人接受归化、尽快定居到北京以及得以立足的最有效手段。此外，传教士们认为，已得到承认的西方数学和天文学的严格性和精确度可以加强其宗教的权威，使得世俗

科学与宗教信仰可以相互支持。

综上所述，在南蛮贸易的招牌下，沙勿略一行得以顺利进入日本列岛，地方各国大名也自由自主地、争先恐后地向西方传教士敞开了自己的“信仰市场”。日本人对世俗贸易利益的渴求，加之葡萄牙世俗、宗教事业的一体化（即保教权制度）为在日耶稣会“商教一体”的传教策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而在中国，社会中坚阶层——士大夫所散发的强烈儒学文化气息，使得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不得不将“圣经”搁置一旁，走“科教一体”的曲折传教路线。“科教一体”与“商教一体”的不同传教策略，显示出中国士大夫的文化至上特性与日本武士（地方大名）的及物精神之间的差别。可以认为，这种“因国制宜”的传教策略其实也是中日不同文化传统所催生的结果。

#### [参考文献]

- [1][日]高瀬弘一郎.キリシタン時代の文化と諸相[M].八木書店,2001.
- [2]赵德宇.论16、17世纪日本天主教的荣衰[J].南开学报,1999,(6).
- [3]曹增友.传教士在中国科技交流史上的作用与影响浅析[C]//卓新平.宗教比较与对话:第4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 [4]谢和耐.中国与天主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M].耿升,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5]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6]艾德蒙·帕里斯.耶稣会秘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 [7][日]宫崎贤太郎.日本人のキリスト教受容とその理解[C]//山折哲男.日本人はキリスト教をどのように受容したか.国際日本文化センター,1998.
- [8]詹嘉玲.为了谁的荣耀?康熙统治时期(1662-1722)耶稣会士的策略[C]//卓新平.相遇与对话:第4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潘丽清]

# 天主教早期在中日两国传教策略比较

作者: [周韬, ZHOU Tao](#)  
 作者单位: [江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刊名: [创新](#)  
 英文刊名: [INNOVATION](#)  
 年, 卷(期): 2009, 3(2)  
 被引用次数: 0次

## 参考文献(8条)

1. 高濑弘一郎 [キリシタン時代の文化と诸相](#) 2001
2. 赵德宇 [论16、17世纪日本天主教的荣衰](#)[期刊论文]-[南开学报](#) 1999(06)
3. 曹增友 [传教士在中国科技交流史上的作用与影响浅析](#) 2003
4. 谢和耐, 耿升 [中国与天主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 2003
5. 李天纲 [中国礼仪之争](#) 1998
6. 艾德蒙·帕里斯 [耶稣会秘史](#) 1990
7. 崎崎贤太郎 [日本人のキリスト教受容とその理解](#) 1998
8. 詹嘉玲 [为了谁的荣耀?康熙统治时期\(1662-1722\)耶稣会士的策略](#) 2003

## 相似文献(10条)

1. 期刊论文 [元华](#) [中国人日本留学史料补遗—兼谈日本亚细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教育](#) -[日本学论坛](#)2004, ""(4)  
 笔者在日本亚细亚大学任教期间,通过资料查询和走访调查,发现了被我国中日关系史及留学日本史研究界忽视了的有关日本战后首批正式招收中国留学生的史料.史料证明,战后第一批留学日本的是中国香港地区的学生,这既是中日两国在战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侧面,也为战后日本亚细亚大学的成立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①
2. 期刊论文 [徐习文, 谢建明, XU Xi-wen, XIE Jian-ming](#) [从日本的中国美术研究看日本侵略中国的图谋](#)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2)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日本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属于“支那史”、“东洋史”的分支;冈仓天心的中国美术研究较明显地带有军国主义思想的印记;即使比较纯粹的学术研究的大村西崖等采取西方科学研究方法,将实地考察和文献研究相结合,准确地判断中国美术品的价值和地理分布,在某种意义上说也为日本掠夺中国珍贵文物资源奠定了基础.由此,从日本的中国美术研究亦可窥见日本侵华的图谋.
3. 期刊论文 [丁志强, 杨伶, DING Zhi-qiang, YANG Ling](#) [一战后日本亚太战略的中国因素分析——以日本《帝国国防方针》的修改为线索](#) -[日本问题研究](#)2009, 23(4)  
 日本乘一战之机,在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南、北两个方向上,初步实施了其对亚太地区的扩张战略.但一战后的华盛顿体制全面否认了日本的在华“优势地位”和“特殊利益”,并对以后日本的扩张施以种种限制.为摆脱国际压力,日本于1923年对《帝国国防方针》进行了第二次修改,明确提出了将美国作为其军备的目标,同时,也要保持对中国的威慑.但实际上,中国始终是日本所认定的首要攻击目标.即使是对美俄作战,也必须要先征服中国,以获得战争的资源 and 作战基地,提高战争能力.为此,1926年,日本制定了更为具体的对华作战计划.
4. 期刊论文 [杨彬](#) [中国古代小说在日本—以日本汉文小说为中心](#) -[明清小说研究](#)2005, ""(1)  
 从东亚历史上汉字文化圈的背景来看,中国文化一直是古代日本学习和模仿的典型.作为中国文学之一翼的中国古代小说,对于日本小说,乃至整个日本文学产生过巨大冲击和影响,这种影响的顶点,可以日本汉文小说为代表.日本汉文小说是日本小说作家以汉文字为叙述语言,描述日本本民族故事、反映日本人民民族感情的一种独特创作.其作者及作品在民族及国别上的“越界”行为,使它天然地具有了双重的“外国文学”的属性,即对中日两国来说,似乎都是外国文学.近年来,随着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和对域外汉文学研究的重视,中国小说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以及它在异域的传承—日本汉文小说都逐渐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处于文化强势地位的中国小说对域外小说强大的影响力,于此也显露无疑.
5. 学位论文 [白华](#) [中国馆藏和刻中医古籍的考察与研究](#) 2006  
 中医古籍的外传,推动了周边国家传统医学的发展.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国外翻刻的特殊形式(或曰版式)的中医古籍.“和刻”(日本刻本)中医古籍即是其中的一种.传入日本的中医古籍,不但将先进的中医药知识和经验带进日本,并且通过“和刻”这种形式在彼邦得到了良好的保存、翻刻和研究.尤其是在日本江户时代,和刻中医古籍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促进了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这些和刻中医古籍在清代及其以后又部分地返传中国.返传的和刻中医古籍中,包括部分中国失传已久的珍贵医籍,对中医药理论知识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目前对返传中国的和刻中医古籍尚未见深入系统的研究.因此本文将中国馆藏和刻中医古籍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目录学、版本学等方法,对其现存数量、种类、特点以及分布情况进行量化的统计分析,以期系统地了解的和刻中医古籍的发生发展历史,为更好地发挥国内和刻中医古籍的作用提供条件.  
 本文以1991年出版的《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为基础,根据本文拟定的考察对象范围,将其中的和刻中医古籍整理出来,辑为《中国馆藏和刻中医古籍目录》,以此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和分析.为了更全面地收集和刻中医古籍的相关资料,笔者于2006年3月赴日本茨城大学进行了实地学习和考察,收集了当地和刻中医古籍的相关资料.  
 本文主体分为4部分内容,分别是:1. 中医古籍传入日本的简要回顾  
 2. 和刻中医古籍的产生与传播  
 3. 和刻中医古籍返传中国的时代和途径  
 4. 国内馆藏和刻中医古籍概述  
 此外,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和刻中医古籍对中日两国传统医学发展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借以对和刻中医古籍进行历史的评价,并呼吁重视对和刻中医古籍的研究.

本文所云“和刻中医古籍”指的是中国医家编撰的、传入日本并经过日本刻印出版的中医类古籍。这类和刻本底本属于传入日本的中医古籍，或以原书基本内容为主，保持原书基本结构框架，辅助性地增加假名训点、眉批、旁注、序跋等内容。

文章先简要回顾了中医古籍传入日本的过程。中国医学流传到日本主要是通过两国人员和书籍的交流进行的。公元562年，吴人知聪经由朝鲜将164卷中国典籍以及佛像、乐器等带到日本，其中包括最早东传的中医药文献《明堂图》。中日之间以书籍为媒介的医学交流自此开始，直到江户时代末期从未间断过。在交通尚不发达的古代，遣唐使、入宋僧和往返于两国间的商人，源源不断地将承载着中医药知识的书籍传入日本。而日本的医学界视书籍为老师，经过上千年的不断地钻研学习，逐渐理解吸收了中医医学的主要精华，并融合本国的医学经验，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汉方医学。

中医古籍流播日本可粗分为早期(江户时期以前)和江户时期两个阶段。隋唐时期，日本积极移植引进中国文化，随着向中国派遣“西海使”(隋代亦称“遣隋使”，唐代亦称“遣唐使”)，中日两国之间也开通了往返于海上的“书籍之路”。考察编成于885年~897年间的日本国家藏书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可以看出中医发展史上比较重要的早期著作，隋唐时期多已传入日本。另外，宋版医书传入日本是从日本平安末期开始的，第一本传入的宋版医书是《大观本草》，自公元1192年开创镰仓幕府之后，日本开始大量引进宋版中国医书。

江户时期日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富有魅力的中国丝绸、纺织品、药品及书籍等源源不断地通过长崎运往日本。据日本学者真柳诚统计：江户时期有传入记录的中国医书除去版本等的差别外共计804种，涉及医方、本草、伤寒、金匮、内经、针灸和痘疹等各个方面。从这些医籍的传入时间来看：江户时代除受到“迁界令”影响的二十年中传入医书数量骤减外，其他时期没有明显的起伏变化。通常的传入记录为每十年60~110次，中期1711~1730年和后期1831~1850年的二十年出现了两次高峰。考察这一时期传入医书的成书年代，大部分是明清时期的著作。特别是明代医书传入后被大量翻刻，对日本医学发展的影响很大。

随着中医古籍大量东传日本，江户时期医籍的翻刻事业也逐渐兴盛起来。关于和刻中医古籍在日本的产生与传播过程，本文主要分为三部分论述。首先介绍了和刻中医古籍兴起的时代背景，重点叙述了江户时期中医古籍的和刻情况，并举出有代表性的和刻中医古籍加以辅助说明。

江户初期，西方和朝鲜的活字印刷技术先后传入日本，促使日本的印刷刊刻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京都、大阪、江户等地，至江户时代后期，医书的刊刻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和刻中医古籍最初以日本古活字本为主，大约兴盛50年后转向采用整版印刷技术，并且逐渐开始重视版本的质量和校勘工作。

据统计：江户时期有传入记录的804种医书中，314种曾经和刻出版过，出版次数达到679次。约半数左右的医书出版于江户前期，尤其集中在内容难解的“内经”以及技术高难的“针灸”方面。从江户中期开始，日本传统医学逐渐走向本土化，日本医家的著作出版增加，与此同时和刻版中国医书需求量减少。后期受到“古方派”的影响，为了翻刻宋以前及清代关于《伤寒论》的著作，和刻版稍微有所增加，但未形成规模。日本是中国周边国家中，输入和翻刻中医古籍最多的一个国家，加之日本历代对医书十分重视，妥善加以保存，往往藏有中国已经失传的古医籍。早在公元1092年，北宋政府就通过高丽使节带回了一些当时中国失传或罕见的中医古籍。日本明治维新后，在“天汉兴洋”之风的影响下，许多汉方医学馆和刊物停办，学术研究一蹶不振，学派气势业已衰落。中医古籍也因此不再受到重视，大部分收藏在图书馆中，还有一部分流散于民间。清末以杨守敬、李盛铎为代表的学者们，积极赴日购回中医古籍。通过他们的努力，大批濒临失传的古医籍回归到中国。近几年来，中日两国学者关注海外现存的散逸古医籍，从日本回归了大批有价值的文献，保证了中医古籍的传承与研究质量。

考察国内馆藏和刻中医古籍，本文主要从数量、种类、返传比率以及分布特点几方面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目前国内馆藏和刻中医古籍221种，考虑版本差异共有448版次。其中，有明确和刻年代记录者共为184种、332版次，刻年代大部分限于日本江户时期。这些和刻中医古籍涉及医经、基础理论、伤寒金匮、诊法、针灸推拿、本草、方书、临床各科、医案医话、医史和养生等十几个方面，其中“临床各科”类占总体的32.4%，“方书”类占17.6%，“伤寒金匮”类占12.5%。

考察中国馆藏和刻中医古籍的刻刊年代，呈现出江户前期刊本数量最多，后期出现小高峰，而中期最少的特点。这一结果与真柳教授所调查的江户时期中国医书翻刻状况相一致。另外，笔者还发现返传中国的和刻中医古籍虽然数量有限，但种类非常丰富。返传和刻中医古籍的种类占总体和刻医书种类的60%左右。其中返传比率较高的“内经类”、“伤寒金匮类”和“针灸类”达到70%以上，“本草类”和“痘疹类”相对较少。由此可见，在回归和刻中医古籍时收集者基本没有偏颇地进行收罗，但避免同一种书籍的重复，尽量返传更多种类的和刻中医古籍。

对比江户时期和刻次数与返传次数前十名的和刻中医古籍，结果有7种相一致，分别是《伤寒论》、《难经本义》、《金匮要略方论》、《医方大成论》、《十四经发挥》、《刀病回春》、《素问玄机原病式》，可见中日两国医家都对这些经典著作较为重视。另外，日本医学家将中国熊宗立的《医方大成》摘去其中的论说，编成《医方大成论》，在日本广泛刊行，并返传中国很多版次。可是这些版次很少被中国再次刊行，此书在中国始终流传很少，由此说明中日两国医家的着眼点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返传中国大陆的和刻中医古籍主要收藏于全国23个藏书机构，分布在7个主要城市和地区。其中北京地区最多，共计380部；其次是上海地区，共计154部。另外，中国东北地区和、江浙一带以及天津所藏也较丰富。藏和刻中医古籍超过10种以上的地区还有四川省。

返传的和刻中医古籍不但种类齐全，而且其中不乏珍本秘籍。如：随“遣唐使”东传日本的《(真本)千金方》，保存了未经宋代改动的原貌，版本价值极高，目前已经回归中国，保存在中国中医研究院等5个藏书机构中。另外，考察《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仅存和刻版本的医书有17种之多，这些医书全部是依靠和刻版本在中国传承下来的。除此之外，中国以返传的和刻医书为底本，出版了若干版本质量较高的医书，如：《康治本伤寒论》、《黄帝轩辕经》、《儒医精要》等书。

现有考察结果表明，和刻中医古籍产生于日本室町时代，在日本江户时期达到刊刻和流传高峰。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和刻中医古籍逐渐衰落，其中部分版次随着中日两国间的医学文化交流返传中国。江户时期中医古籍的大量翻刻，不但促进了中国医学在日本的传播，还促使日本传统医学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汉方医学。返传中国的和刻中医古籍弥补了部分中国亡佚古医籍的欠缺。回归和出版这些返传的和刻中医古籍，将对中医药文献的保存、传承和研究发挥巨大作用。

本文以上考察研究结果，为了解国内馆藏和刻中医古籍的收藏地点、数量和学术价值提供一定参考。和刻中医古籍的返传，对当代中医事业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本文研究的结果，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对和刻中医古籍的重视，进一步加强对此类中医古籍的保管和收集，为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便利条件。

## 6. 期刊论文 杨彬、吴佳娜 中国古代小说与古代日本汉文小说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37(6)

日本汉文小说是日本小说中一个独特的类型。它们是日本小说作家以汉文字为叙述语言，描述日本本民族故事、反映日本人民民族感情的一种独特创作。多年来，由于这种小说形式上的“汉化”和内容上的不相一致，致使它们同时被排斥在中国和日本小说的研究视野之外，其面貌不为人所知。事实上，它们虽然从文学疆域划分的角度上属于日本，但无论其语言风格、文体形式，还是小说旨趣等等，它们又的确深受中国小说的深刻影响，甚至是自觉模仿。这一切，显示了处于文化强势地位的中国小说对域外小说强大的影响力，及其在文学交流中不可取代的价值。

## 7. 期刊论文 真柳诚 日本江户时期传入的中国医书及其和刻 -中国科技史料2002, 23(3)

江户时期，中国医学知识大多通过书籍传到了日本，其中部分书籍凭借和刻(日本刻)版，在日本普及并被广泛接受。作者对传入的中国医书及其和刻版进行了调查和比较分析，因为该方法有可能历史地、量化地把握中国医学传入和被一般社会所接受的实际状况。结果如下所述：有传入记载的中国医书为804种、1917次，这些均为在中国流行、部头大，并能以高价售予日本的书籍。中国医书的和刻版为314种、679次，约半数出版于江户前期，尤其集中在内容难解的“内经”及技术高难的“针灸”方面。单经(白文)本在注释本发行40~50年之后有和刻。从江户中期开始，随着医学的日本化和日本医书的出版增加，中国书的和刻版急剧减少。所有传入医书约40%有和刻版。50年内从传入至和刻的比率高达46%，这种时间差越在江户早期越短。早在江户前期，和刻版中的畅销医书已经是3卷以内的薄册，且大多与当时中国的流行医书或最新医书无关。另外，在整个江户时期，也有从大部头书中拔粹或摘编的现象，由此可窥知日本特色的小型化嗜好。据此，日本在江户时期，从自身角度接受了中医医书，并进而接受了中医学，同时加以日本化。

## 8. 会议论文 王亚雷、小平、李德义 中国茶叶在日本 2001

近20~30年来，在一衣带水的日本，先后流行三次中国茶，每次都有助于中国茶叶在日本的推广，有助于中国茶文化的弘扬。在日本各地不断地有新的中国茶(馆)开业，同时，不仅中国餐馆连一些日本料理店也增加了中国茶的服务。饮料公司在中国茶水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不断生产推出各种易拉罐茶饮料。中国茶叶出口到日本的品牌有青茶(乌龙茶)、蒸青绿茶及红茶和名优绿茶，其中以乌龙茶的量为最多(1.5万~2万吨)。随着日本人民对中国茶叶的认识的深入，中国茶叶市场将会越来越大，对品质和花色品种的要求也会提高。

## 9. 期刊论文 李颖、王洪波 西学东渐与日本文艺学的近代化转型——兼谈日本文艺学对中国的影响 -时代文学(双月版) 2007, ""(1)

西学东渐以来,日本在吸收和融会西方文化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成为东西方思想的交汇点.在文艺学领域,日本文学的近代转型,勾勒出近代以来日本艺术精神与西方艺术精神交流并得以完善包身的脉络或轨迹,同时在理论的深度、广度以及意识的自觉性等方面都超过了同时代的中国.这也造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即日本在中国吸收西方文艺理论的过程中发挥了“中间人”的作用,对中国文艺学的近代化转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 10. 学位论文 张世响 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从绳文时代后期到平安时代前期 2006

中国与日本是隔海相望的近邻,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原始和古代社会,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以日本接受中国文化为主要特征.日本内藤虎次郎博士形象地比喻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民族进化的点化作用:“与中国文化接触之前,日本民族好比是豆汁.中国文化好比是卤水.日本民族与中国文化一经接触,立即变成了豆腐.”<①>

中日文化交流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与世界各民族一样,日本有其独特的文化.原始日本人在岛国特殊地理环境下,创造了日本固有的原始文化,即持续近八千年的绳文文化,这表现出岛国环境下形成的日本文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同时,日本文化又具有开放性和受容性,这主要表现在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上.绳文时代后期,当日本人最初接触到中国文化时,他们的态度是积极吸收.他们积极接受先进的中国文化,并在绳文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新的文化,即弥生文化.纵观日本文化发展的历史,在明治维新运动开始接受西方文化之前,各时期的日本文化在其形成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

中日两国学者就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做过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研究状况来说,迄今为止的研究,在研究资料的使用上,多以中国史籍记载为主要依据.在研究的角度上,多从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入手.在研究的时段上,多注重对隋唐及其之后的中文化交流研究;因为隋唐及其之后,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交流多,而且资料比较丰富.相比之下,直接使用日本原始的第一手资料、从日本接受中国文化的角度入手、对日本原始时代和古代进行的研究则比较少,研究成果也不多.

本文则主要运用日本资料,从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接受入手,去研究隋唐之前,即日本绳文时代后期至平安时代前期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研究探讨认为,日本在接受中国古代文化的过程中有如下三阶段的变化:

绳文时代后期至弥生时代前期坐等接受,原封不动地加以吸收和利用.绳文时代后期,以箕子东迁朝鲜半岛为契机,中国文化东传到朝鲜半岛,其影响波及

日本列岛,日本开始接触、接受中国文化;接下来,又有徐福东渡日本和卫满东移朝鲜等移民活动,中国古代文化源源不断地传播到朝鲜半岛、传播到日本列岛.当时的日本,正处在绳文时代晚期和弥生时代早期,其文化仍落后于中国,因此,当先进的中国文化“主动送上门”时,好学的日本民族采取的态度是来者不拒,原封照搬.当然,最初接受是一种被动的接受,凡是传到日本的中国文化,几乎都原封不动地被吸收和利用.例如:水稻及其他粮食作物的种植技术,铁器、青铜器等金属工具的制造与使用技术,养蚕、纺织、制衣等技术,诸如此类的先进文化,都被日本一一接受下来.这些先进的中国文化,都是公元前中国的箕子、徐福、卫满等移民们陆续陆续地、直接或间接地传到日本的.弥生时代中期日本主动摄取,有选择地摄取.感受到先进文化的优越性之后,从弥生时代中、后期开始,日本人已经不再满足于仅仅在家门口等待传来什么就接受什么的状态,于是,开始主动走出国门,积极寻找并摄取中国文化.如:公元57年,倭国向东汉派出了使者;后来,倭女王卑弥呼多次遣使与三国时的魏国交流;大和时代,为了建立统一国家,倭“五王”频繁与南朝刘宋政权交流,遣使朝贡,请求“除授”和“册封”;同时,还聘请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博士、官员等前往日本,传授送医.这期间,日本还摄取、接受了汉字、儒学、汉化佛教等中国文化.到了飞鸟时代,建立了统一国家之后的日本,以圣德太子为首的日本统治者,开始向中国派遣使者,以“多得文书宝物”为目的的遣唐使把主动摄取中国文化的浪潮推到了顶峰.日本从本国各阶段的建设需要考虑,缺少什么就从中国摄取什么,并非不分良莠全盘照搬.即使进入了全面接受中国文化的奈良时代,也做到了该拒绝的决不摄取.如:中国古代的宦官制度,始终没有被日本接受.

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边接受,边消化吸收,边发展创造.同本在接受、摄取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一直表现为在接受、摄取的同时,加以发展和创新.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表现尤为突出.大部分中国文化被接受后,都是先经过充分消化、吸收,使之日本化,之后,再使之成为发展、创造日本民族文化的养分.最后,创造出具有大和民族特色的日本文化.如:奈良时代平城京的建造,律令政治制度的建立;平安时代假名的发明,和汉文学的交替变迁,等等.

关于上述内容,本文分为上、下两编,计九章进行讨论.前五章为上编,探讨自日本原始社会中绳文时代后期开始到弥生时代为止,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接

受情况;后四章为下编,探讨日本古代社会中从大和时代到平安时代前期,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以及在接收、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创新等方面的情况.上编,绳文时代后期(公元前1000年前后),正值中国的商末周初.以箕子东迁朝鲜半岛为代表的中国移民,把中国文化带到了朝鲜半岛.同时,其影响波及日本列岛,从而为日本接触、接受中国文化创造了条件.接下来,绳文时代晚期,以徐福东渡为代表的数量众多的中国移民,先后经过朝鲜半岛到达日本,带去了先进文化和技术,推进了日本文明化的进程.日本历史上出现了一种不同于绳文时代文化的崭新文化,即弥生文化.之后,公元前195年又出现了卫满率众逃亡朝鲜半岛的移民事件,这种逃亡性的移民事件到汉武帝灭亡卫氏朝鲜和设置“四郡”时达到顶峰.中国内地大量的民众迁到了朝鲜半岛,先进的中国汉文化移植到了朝鲜半岛的大部分地区,灿烂의乐浪文化一直存在到公元313年,几乎伴随了同本弥生时代的始终,故而弥生时代的文化产生了不少的影响,促使同本社会大进步、经济大发展.弥生时代后期,日本产生了贫富差别,产生了不同的阶层,出现了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奴隶主和奴隶,出现了古代部族国家.部族国家的出现,标志着日本原始社会的结束和古代社会的开始.

下编,经过战争,许多的部族小国逐渐被统一为大和国,日本进入古代社会.大和时代(公元300年左右至592年),初建国家的日本,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文化上,各个方面都积极学习、摄取中国文化.飞鸟时代的圣德太子因积极学习、接受中国文化,被称为接受、摄取中国文化的先驱者;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前期,正值中国的盛唐时期,日本采取派遣遣唐使等多种方式,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汲取中国文化,几乎达到了全盘照搬的程度.可以说,此时期同本接受中国文化达到了顶峰.至平安时代前期,日本认为,唐文化的精华已经汲取殆尽,加之遣唐使费用昂贵等原因,于公元894年,停止了遣唐使的派遣.此后,日本大规模接受、摄取中国文化告一段落,转向重点对已经摄取的中国文化进行消化、吸收和发展、创新.具有大和民族特色的日本文化,就是这样在先进的中国文化的浸润、滋养中逐渐形成的.

本论文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

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本文从日本接受中国文化的角度切入,分析日本文化发展的历史,论证日本接受中国文化对日本文明进程的影响.在日本接受中国文化的大前提下,在具体论证中采取了纵横交错、多管齐下等多种方式,在充分运用考古发现、民间习俗、神话传说等文献资料以及图片和口头资料的基础上,把日本接受中国文化的过程分三个阶段:一是被动接受阶段,二是主动摄取阶段,三是边接受边发展创新阶段.就此综合探讨论证日本接受中国古代文化的情况.

二、在研究资料的使用上,以日本的原始资料为主.如文中使用的考古、民间习俗、神话传说和图片资料等,大都是采自日本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适当使用中国方面的资料,如《史记》、《后汉书》、《三国志》等.

三、在研究观点上,本文主要有三个创新点:

(一)箕子东迁朝鲜半岛、徐福东渡日本和卫满东移朝鲜半岛,这三次大的移民活动,既直接把中国文化传播到了朝鲜半岛并波及日本列岛,更为日本接受中国文化创造了前提条件.在当时的条件下,正因为有上述三次大的移民活动,中国文化才得以东传,日本才有接触和接受中国文化的可能.

(二)三次移民活动中,箕子和卫满到达的目的地主要是朝鲜半岛,徐福东渡日本时也经过朝鲜半岛;三次大的移民活动把中国古代文化首先传播到朝鲜半岛,然后再传播到日本列岛;日本最先与海外接触和交流也经朝鲜半岛中转.因此可以说,在航海线路开通之前,没有朝鲜半岛的中转,同本不可能接触到中国文化,更谈不上接受中国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朝鲜半岛成为日本接受中国文化的桥梁.

(三)学界大多认为,日本接受中国文化是从弥生时代开始,或者从绳文时代晚期开始;根据最新考古结果,也有学者提出绳文时代后期,同本已经开始接受中国文化的观点,但是,却没有明确指出谁把中国文化传到同本.本文从考古发现、文献记载、民间习俗信仰等方面论证认为,公元前1000年左右箕子东迁朝鲜半岛时,少量的移民已到达日本,中国文化的影响已经到达日本列岛.也就是说,公元前1000年左右,箕子东迁朝鲜半岛时,把中国文化带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日本才开始接触、接受中国文化.从而,为同本接受中国文化的提前到绳文时代后期的观点补充了证据.

由于手头资料受限,加之本人才疏学浅,论文中肯定有错误和不足之处;有的问题尽管意识到了,但是没能展开研究,如:乐浪文化在同本影响的具体情况以及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三地间的文化传承和相互影响的情况等,都有待于今后继续探讨.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cx200902004.aspx](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cx200902004.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f3142e19-dd3d-422a-9b41-9e4d006fcb1f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